

60年后再评赫鲁晓夫的改革

陆南泉

(黑龙江大学俄罗斯语言文学与文化研究中心, 哈尔滨 150080)

提 要:赫鲁晓夫的改革至今已过去整整60年。如何看待赫鲁晓夫其人与他执政时期的历史作用?历史至今还没有对此作出一个全面的和应有的评价。本文以历史事实为依据,重新思考赫鲁晓夫年代的一些问题,力图对赫鲁晓夫与其执政时期的重大历史问题给出一个全面、客观的分析。

关键词:赫鲁晓夫;改革;反思

中图分类号: D503

文献标识码: A

1 引言

1953年3月5日,斯大林去世。赫鲁晓夫克服了一个接一个障碍,最终成了斯大林之后苏联历史上第一位最高领导人(不算马林科夫的短暂执政¹)。1956年2月召开苏共二十大,2月25日赫鲁晓夫决定并亲自向大会作了题为《关于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的“秘密报告”。1964年10月14日下午召开的苏共中央全会上,解除了赫鲁晓夫苏共中央第一书记、苏共中央主席团委员的职务;12月9日,苏联最高苏维埃举行会议,解除赫鲁晓夫部长会议主席职务。这样,通过“宫廷政变”结束了赫鲁晓夫时代。从1956年2月召开苏共二十大至今已过去整整60年后,本文想回过头来,再思考一下赫鲁晓夫年代的一些问题。

如何看待赫鲁晓夫其人与他执政时期的历史作用?在20世纪60年代中苏大论战时期,把赫鲁晓夫时期的改革、政策、路线说成是“违背马克思列宁主义所指出的社会历史的发展规律”的,把赫鲁晓夫说成是“现代修正主义的头号代表”。²而现今,还有人把赫鲁晓夫时期的改革视为“对苏联社会主义基本经济政治制度的否定,这就为日后苏联解体、苏共垮台这大山般的倒塌掘了第一锄,也可被称之为关键性的第一锄”(李慎明 2011: 21)。甚至,还有人把苏联发生剧变的原因,归结为由于赫鲁晓夫揭露与批判了斯大林的个人崇拜。看来,“历史至今还没有对他(指赫鲁晓夫——笔者)勇敢走出的一步作出全面的和应有的评价”(亚·尼·雅科夫列夫 1999: 11)。

究竟怎么客观、全面地认识赫鲁晓夫与其执政时期,仍是需要深入研究的一个重大历史问题。

2 斯大林给赫鲁晓夫留下了一个什么样的苏联

赫鲁晓夫上台时,面临着十分复杂的局面和艰巨的任务。正如苏联著名政论家费奥多尔·布尔拉茨基指出的,放在当时赫鲁晓夫面前的斯大林所留下的苏联是:“越来越贫困的、实际上半崩溃的农村、技术上落后的工业、最尖锐的住房短缺、居民生活的低水平、数百万人被关押在监狱和集中营、国家与外部世界的隔绝——所有这一切都要求有新的政策和彻底

的变革。于是，赫鲁晓夫——正是这样！（象人民期望的那样）成了新时代的先驱者。”（尤里·阿法纳西耶夫 1984：584）亚·尼·雅科夫列夫在分析赫鲁晓夫上台时前任给他什么样的遗产时写道：“赫鲁晓夫继承了一份可怕的遗产。1953年初，专制制度的狂妄行为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千百万人还关在劳改营和监狱里。”“农村过着赤贫生活，战后完全荒芜。每天晚上集体农庄的作业队长总是沿着村里的街道一户一户地给成年人派明天的任务。他这种派工也是吃力不讨好，因为那些由于繁忙的家务变得凶狠的婆娘们都做嘲弄的手势，而留在农村的男子汉则一边骂娘一边诅咒为‘工分’、为工作日去干活。”“儿童们拎着粗布袋在收割过的麦子的布满麦茬的地里捡掉下来的麦穗。”“每个农户在整个春天和夏天向收货站交牛奶，而秋天交牲畜和家禽，这是在交实物税。”“斯大林爱好历史，熟知农奴制的一套规章制度，他原封不动地通过强硬手段把它们运用于我国农村。”“20世纪中叶，俄罗斯的农村成了国家农奴制农村，而且国家从农民那里夺去了除空气以外的所有东西。”（亚·尼·雅科夫列夫 1999：15）

当然，以上的一些论述是十分概括的和简要的。当时苏联的实际情况与存在的问题要复杂得多，赫鲁晓夫面临很多难题。怎么解决，只能通过更新政策与根本性的改革才能找到出路。赫鲁晓夫执政年代，他向人民表明，他对此是有深刻理解的，改革确是赫鲁晓夫的本意。尽管他的改革有时表现得反复无常，但一直到他下台前，改革一天也没有停止过。

3 批判斯大林个人崇拜是改革必须走的、绕不过的一步

赫鲁晓夫为了推行改革，需要对斯大林的遗产有个清楚地认识：先要站稳脚跟，掌握权力；必须破除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赫鲁晓夫无论是上台初期进行初步调整政策，还是后来进行重大改革，都是要求务必解决一些迫切问题。要求消化这份沉重的、涉及到方方面面的遗产，想回避它是不可能的。否则，赫鲁晓夫就难以进行改革。而通过批判斯大林个人崇拜，揭开斯大林苏联社会主义模式的严重弊端，是改革斯大林体制模式必须走的重要的绕不过的一步。因此，从体制改革角度来看，它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就是说，苏联要向前发展，就必须对斯大林体制模式进行改革。因此，“非斯大林化”成了赫鲁晓夫上台后的必须解决的一个重要问题，也是赫鲁晓夫执政时期的一个主要标志。

赫鲁晓夫在 1956 年 2 月向苏共二十大作《关于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的“秘密报告”前，一方面克服各种障碍，巩固自己的领导地位；另一方面，同时在恢复国内政治生活正常化方面采取一些措施：首先要消除政治恐怖，让人民过正常生活。要防止斯大林时期严重破坏法制的不正常状态不再重演，消除广大人民、干部的政治恐怖；消除贝利亚，为政治领域进行整顿清理创造前提条件。消除贝利亚，在当时这被认为在苏联历史上意味着一个恐怖时代的结束，对苏联社会政治生活和人民的思想来说，意味着解冻的第一步；对苏联今后政治领域的整顿清理和体制改革来说，扫除了一个障碍；清理冤假错案，全面平反昭雪。据估计，在斯大林时代被关进集中营的有 1200—1300 万人。赫鲁晓夫从集中营释放“政治犯”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它所产生的积极影响是不可低估的。这些被释放的人，要求有强有力的法律制度来作保障，使斯大林时期的镇压和恐怖行动不再重演；要求采取组织措施，改组国家安全机构和健全司法制度。为了使苏联社会有安全感，赫鲁晓夫对国家安全机构进行改组，并健全了司法制度，检察机关的职权逐步得到恢复；等等。

另外，还应指出的是，赫鲁晓夫上台后，苏共在采取上述措施过程中，一方面，提出了“加强社会主义法制”的口号；另一方面，组织理论界批判斯大林有关苏联愈向社会主义前进，阶级斗争就愈尖锐的错误理论，从而从理论上消除了粗暴地破坏社会主义法制与大规模进行镇压的论据。

在采取上述措施过程中，赫鲁晓夫也着手为反对斯大林个人崇拜作准备。有关赫鲁晓夫反对个人崇拜、批判斯大林等问题，已作了大量的研究，出版了大量论著，笔者不想作一般

泛泛地论述，而是想从体制改革这个角度作些分析。

1953年苏共中央七月全会，正式开始了批判个人崇拜。但到1953年底，并没有以苏共或其他组织名义公开点名批判斯大林。对斯大林的批评仅在党内上层内部进行。但要指出的是，赫鲁晓夫本人对斯大林公开点名批评，也并不是从1956年苏共二十大开始的。1954年赫鲁晓夫在滨海边疆区对包括渔船船长在内的当地积极分子的一次讲话中，“他对斯大林时代讲了一段很尖锐的话。……当时他说：党当前面临着—项任务，这就是‘要把在斯大林年代被糟蹋掉的、被轻率地消耗掉的人民信任的善意一点一滴地收集起来’”（亚·尼·雅科夫列夫1999：12—13）。1955年4月12日，赫鲁晓夫在农业工作会议上，在农业问题上也公开地批评了斯大林。（邢广程1998：25—26）随着国内外形势的发展，反对个人崇拜、批判斯大林的呼声日益强烈。这是因为：第一，在1954年到1955年间，在苏联全国范围内审讯贝利亚的同案犯过程中，从调查出来的大量材料证明，在苏联搞大清洗、搞恐怖的核心人物不是别人，而是正是斯大林。因此，再要把一切罪责推给贝利亚，已难以自圆其说了。第二，审讯贝利亚的同案犯是公开进行的，全国各地很多党员、干部、知识分子与前政治犯都参加了，这在推动反对个人崇拜进程中起了很大作用。第三，由于平反工作进展缓慢，集中营里还有大量的政治犯。当审讯贝利亚的同案犯、“医生谋杀案”和“列宁格勒案件”平反的消息传到集中营时，大量政治犯强烈要求尽快平反，有些集中营甚至发生了暴动。第四，对苏共与其他国家共产党关系中存在的问题，特别是苏南关系，苏共把责任推给贝利亚，引起了南斯拉夫领导人的强烈不满，因为主要责任在斯大林。苏共领导亦感到，不批判斯大林，就难以与其他兄弟党关系正常化。

在上述情况下，赫鲁晓夫感到再也无法容忍下去。当时赫鲁晓夫是这样描述自己的心情的：大量触目惊心的事实，“沉重地压在我的心上”，“几十万被枪毙的人使我良心不安”，一种为无辜蒙冤者恢复名誉的崇高责任感和正义感使我在二十大会议的一次休息期间“鼓足了勇气”，向苏共中央主席团提出反斯大林个人崇拜问题³，决定在1956年召开的苏共二十大上，把反对个人崇拜的斗争推向高潮。在会议的最后一天，赫鲁晓夫决定由自己向代表们作了《关于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的“秘密报告”。赫鲁晓夫在报告的开头就指出：“斯大林死了以后，党中央奉行的政策是要详细地、彻底地阐明：决不允许把一个人吹捧到具有神仙般那样超自然性格的超人地步。我们还指出：这种做法是没有任何一点马克思主义气味的。这种做法就是认为这样的人物什么都懂得，什么都了解，他能代替一切人思考，他什么都能做，他的行动绝对没有错误。”“长期以来，在我们中间培育着某个个人，具体地谈也就是对斯大林的这种崇拜。”赫鲁晓夫接着说：“我这个报告的目的并不在于全面地评价斯大林政治生涯及其活动，就斯大林的功绩而论，在他活着的时候已经写过无数这方面的书籍、小册子、研究性文件，就斯大林在准备和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过程中所起的作用以及他在内战时期和我国建设时期所起的作用作了大量的宣传。这是众所周知的。我们现在关心的是一个无论现在还是将来对党都是极为重要的问题，即对于斯大林的个人崇拜到底是怎样慢慢滋长起来的。而这种个人崇拜又怎样在特定的阶段成了给予党的各项原则，党内民主以及革命的法制秩序的极其严重的极其深刻的危害的一切事情的根源的。”

苏共二十大后，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引起了国际与国内的强烈反应。国际共运内部出现动荡，格鲁吉亚共和国发生骚动。在内外压力下，赫鲁晓夫转而发表了一些颂扬与肯定斯大林的话。但在1961年10月召开的苏共二十二大上，赫鲁晓夫再一次掀起公开批判斯大林个人崇拜的高潮。

纵观批判斯大林个人崇拜的过程，联系到赫鲁晓夫回忆录，可以看到，赫鲁晓夫在他执政后，在斯大林个人崇拜、严重破坏法制和集体领导原则等问题上，总是持严厉批判态度的。尽管由于受国内外形势的牵制，他也不时地出现过来回摇摆。

批判斯大林个人崇拜，揭开斯大林苏联社会主义模式的严重弊端，是改革斯大林体制模

式必须走的重要步骤。因此，从体制改革角度来看，它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1) 个人崇拜是斯大林—苏联体制模式的产物

人们认识到，个人崇拜是斯大林—苏联体制模式的产物。

在苏联出现极其严重的斯大林个人崇拜，这绝不是由最高领导人个人品性决定的，它最重要的根源在于过度集权的政治与经济体制。关于这一点，应该说在苏共二十大之后，当时不少共产党的领导人有深刻的认识。南共联盟领导人铁托指出：“个人崇拜，实际上，是一种制度的产物”，“这里不仅仅是一个个人崇拜问题，而是一种使得个人崇拜得以产生的制度，根源就在这里。”⁴波兰领导人哥穆尔卡认为：“个人崇拜不能仅仅限于斯大林个人。个人崇拜是一种曾经流行于苏联的制度，而且它大概曾经移植到所有的共产党，以及包括波兰在内的一些社会主义阵营国家。个人崇拜的制度的实质在于这样一个事实：产生了一个个人的和层层崇拜阶梯。每一种这样的崇拜都包含它发挥作用的一定领域。在社会主义国家集团里，斯大林站在这个特权的崇拜阶梯的顶端。所有站在阶梯的较下层的人都向他鞠躬致敬。那些鞠躬的人不但有苏联共产党的其他领导人和苏联的领导人，而且还有社会主义阵营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的领导人。后者也就是各国党中央委员会的第一书记，他们坐在一个人崇拜阶梯的第二层，也披着不会犯错误和英明的大袍。但是对他们所受的崇拜只是存在于一定国家的领土范围以内，在这些国家里，他们站在他们本国的崇拜阶梯的顶端。这种崇拜只能称为是一种反射的光彩，一种借来的亮光。它的光同月亮的光一样。尽管这样，它在它的活动范围内仍旧有无上权力。这样，在每个国家里又有从上而下地坚持着崇拜的阶梯。”（邢广程 1998：95—96），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最后一任总理汉斯·莫德罗（Hans Modrow），在其《我眼中的改革》一书中写道：可以从两个方面来看待斯大林时期：“一方面，斯大林歪曲社会主义到了令人无法相信的程度；另一方面，他又发现和继承了从列宁开始的社会主义的一些天生的不足。”例如，实行民主集中制的原则，却丧失了民主这个核心，导致管理上的独裁和专制主义，从而产生个人崇拜。1918年，联共（布）党内谁也没有想到斯大林会是下一任总书记，因为苏维埃政权刚刚萌芽。当时，罗莎·卢森堡就警告说，要防止党的机关变成未来的专政机关。她的担忧变成了现实。斯大林按照他自己的模式建立了无产阶级专政。不管这种专政是苏联模式，还是德国模式、波兰模式、捷克模式、匈牙利模式、罗马尼亚模式或者保加利亚模式，都是不可避免的，也是命中注定要失败的。我认为，改革就是想医治社会主义的这种天生不足。”莫德罗把斯大林模式在政治方面的主要弊端归结为没有民主。他在该书的自序中写道：“我们的社会主义模式失去了在各个环节上不断革新党的行之有效的民主机制……没有民主机制，正是我们的模式崩溃的一个主要原因。”缺乏民主，先会产生领袖的个人专权独裁，并发展到个人崇拜。他写道，在斯大林模式条件下，“把个人的作用绝对化，从而大搞个人崇拜（尽管在大力宣传人民群众创造了历史）……在十月革命后，政治家的画像取而代之。不管他活着还是死了，都像圣像画一样被到处张贴和悬挂。共产党员的希望、追求和理想都寄托在党的领导人身上，特别是寄托在领袖的个人身上”。在谈到民主集中制问题时，莫德罗指出，在斯大林模式条件下，“实行民主集中制的原则，却丧失了民主这个核心，导致管理上的独裁和专制主义，从而产生个人崇拜。由于把民主集中制原则中抽掉了民主，这样，在没有民主的条件下，加上斯大林长期实行不受法律限制的无产阶级专政，不论党内还是广大民众都不敢讲真话，发表自己的看法……”，开会时大家“只是点头，一言不发。这是当时许多人的一种选择：好多人很悲观，大家想到了也看到了问题，但是谁也没有勇气当众说出来。大家人云亦云，谨小慎微，因为谁也不愿意捅破那层窗户纸。”（汉斯·莫德罗 2012：19—20）

以上的分析都说明，个人崇拜是斯大林—苏联体制模式的产物，因此，认识了这一点，就必须从改革体制着手，才能从根上解决这个问题。意大利共产党领导人陶里亚蒂也指出了“斯大林的错误同苏联的经济和政治生活中，也许首先是整个党的生活中各个官僚

机构的分量过分增长有关”这一事实后，他得出的结论是，要解决个人崇拜问题，“有必要在体制内部进行甚至是深刻的修改”，改革“极端的中央集权形式”。

邓小平同志在作出中国推行改革开放政策的战略时，总结了中国与苏联的历史经验教训，特别强调了要从制度上去解决问题。他说，制度问题“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走向反面。即使像毛泽东同志这样的伟大人物，也受到一些不好制度的严重影响，以至对党对国家对他个人都造成了很大的不幸。”小平同志接着还讲：“只有对这些弊端进行有计划、有步骤而又坚决彻底的改革，人民才会信任我们的领导，才会信任我们的党和社会主义，我们的事业才有无限希望。”⁵

（2）斯大林—苏联体制模式并非唯一正确的模式

人们认识到，斯大林—苏联体制模式并非唯一正确的模式，因此需要变革。

通过对斯大林个人崇拜的揭露与批判，才有可能对苏联传统模式进行批判性的认识。正如俄罗斯著名学者阿尔巴托夫指出的：“苏共二十大向人们讲出了他们曾经猜测的许多事情的实话后，与其说它给我们的社会提供了答案，毋宁说是提出了问题——它的历史意义恰恰就在这里。当时谁也没有答案，重要的是把主要的问题极其尖锐地摆出来，即必须变革，必须探索新的社会主义模式。但是为了能够有说服力地提出问题，就必须说出有关过去的严酷的真话。说明我们的社会发生了什么，斯大林主义把它带到哪里去了。在这个意义上，揭露斯大林及其罪行是赫鲁晓夫所能做的最有效的行动。”（格·阿·阿尔巴托夫 1998：56）各国共产党也深刻地认识到，斯大林时期所建立起来的苏联体制模式，不论在政治上还是经济上，都存在严重的弊端。这个问题特别在战后表现得更为明显。个人崇拜不只是制约了苏联社会各个领域的发展，还严重地束缚了国际共运的发展，使得各社会主义国家从本国具体条件出发，独立自主地决定本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政策，选择符合本国实情的体制模式，对明显已成为阻碍社会经济发展的体制进行改革。不反对个人崇拜，斯大林模式还将是绝对正确的，不能离开它一步。所以，随着对个人崇拜的批判，不只消除了对斯大林的个人迷信，更重要的是使人们认识到斯大林—苏联模式并不是唯一正确的模式，从而推动了人们对社会主义模式多样化的探索。苏共二十大后，一些社会主义国家，特别是南、匈、波、捷等国力图通过改革建立符合本国国情的体制模式，决定走自己的道路。意大利共产党总书记陶里亚蒂明确指出：“苏联的模型已经不能并且也不应当被认为是必须遵循的模型了。”⁶哥穆尔卡指出：“社会主义的形式也能够是不同的。它可以是在苏联产生的那种形式，也可以是像我们在南斯拉夫所看到的那种形式，它还可以有别的不同形式。只有通过各个建设社会主义国家的经验和成就，才能产生在一定条件下最好形式的社会主义。”⁷上个世纪50年代中期开始的东欧一些国家的改革，也充分体现了一些国家对社会主义不同模式的探索。在这里，应该指出的是，允许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建设可以走不同的道路，可以有不同的体制模式，在苏联赫鲁晓夫是起了带头作用的。1955年6月赫鲁晓夫率苏联政府代表团访问南斯拉夫，为恢复苏南关系作出努力。这次访问不仅使苏南两国建立了新型的国家关系，即两国关系应建立在相互尊重他国的主权、独立、领土完整和互相平等的基础上，而且赫鲁晓夫认为，社会主义可以有不同的道路，并承认南建设社会主义的独特道路。他说：“如果你们认为你们的做法好，那我们祝你们成功。至于说到我们，我认为我们仍将采用自己的方法，但是，无论是我们还是你们，更深入地研究彼此的经验，学习那些被证明是有用的经验，是有好处的。但是这是一种自愿的事情。”⁸在发表《两国政府宣言》中也明确地说：“互相尊重并且互不以任何（经济上的，政治上或思想体系上的）理由干涉内政。因为国内制度问题，社会制度的不同和发展社会主义的具体形式的不同是各国人民自身的事情。”

（3）解放思想，活跃理论研究

促进思想解放，活跃理论研究，从而为推动改革创造条件。

理论的创新与发展，是推动体制改革的重要因素。像赫鲁晓夫在“秘密报告”中说的那样：“在斯大林总是正确的”、“他能代替一切人思考”的情况下，理论不可能发展，只能是僵化的教条。大家都按斯大林的指示办，都按斯大林的理论行动，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也不能离斯大林总结的“共同规律”一步，这样，斯大林的体制模式就难以进行改革，并且越来越僵化。通过对个人崇拜的批判，在赫鲁晓夫执政时期，人们的思想得到了解放，围绕改革展开的理论讨论十分活跃。这些对推进体制改革无疑是重要的。

（4）直接推动了改革的进程

这里，首先应该指出，在酝酿反对个人崇拜过程中，同时也推行了一些调整与初步的改革政策与措施。在苏共二十大前，苏联通过了大量决议，以解决斯大林时期留下的急待解决的问题。从经济领域来讲，1953年苏共中央九月全会，通过了《关于进一步发展苏联农业的措施》的决定，以此为契机，一步一步的推动农业的改革。对工业也进行了一些调整与改革，扩大了加盟共和国与企业的权限。1954年10月14日有关改进国家机关工作措施的决议，要求精简机构和行政管理人员，整顿核算、报表和计划工作，这是作为“保证根本改进国家机关工作的第一步。”⁹从政治领域来讲，围绕反对个人专权，实行集体领导原则，进行了不少调整与改革措施，这主要有：改变了自1941年起斯大林一人身兼党政军大权这种党政不分的状况。斯大林逝世后，马林科夫以苏共中央书记兼任部长会议主席，但仅仅任职9天，后来只任政府首脑，赫鲁晓夫任党的最高领导人。党政最高领导职务分开，这是避免权力过分集中在一个人手里，防止破坏集体领导原则、决策中主观主义和工作中的一言堂，具有重要意义。为了恢复党内生活正常化，恢复了定期召开党代会和党中央全会的制度。

在苏共二十大之前，苏联采取的上述调整与改革措施都是初步的。要进行更深入的重大改革，不从思想上、政治上破除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那是不可能的。

4 经济领域改革的主要内容

4.1 首先着手的农业改革

在上面我们分析了赫鲁晓夫上台执政时所面临的复杂形势，重点放在当时苏联的社会政治领域。论述这方面的问题，主要想说明，赫鲁晓夫要对经济体制作出重大改革，首先，要在国内为中国人民和干部创造一个正常的政治生活环境，摆脱斯大林时期的恐怖；其次，要破除对斯大林个人的迷信，消除思想上的种种禁锢；最后，赫鲁晓夫通过错综复杂的斗争巩固自己的领导地位，握有强有力的权力。这些，赫鲁晓夫逐步做到了。这里要指出的是，赫鲁晓夫围绕上面三个方面进行争斗的过程中，并不是撇开改革单打一地进行的。实际上，他一上台就着手经济政策的调整和某些领域初步的改革。这些对他权力的巩固也有重要的意义。这里集中论述赫鲁晓夫执政以来的农业改革。

赫鲁晓夫上台后，在巩固自己政治领导地位的争斗过程中，之所以很快地赢得人心，其中一个十分重要的因素是，他首先对农业进行了一系列重大改革。这样做决不是出于他对农业的特殊爱好，而是出于当时苏联客观情况的要求。

4.1.1 把农业改革放在突出的优先地位

赫鲁晓夫上台时，面临的农业问题是十分尖锐的。由于战后苏联没有把注意力放在与人民生活密切相关的农业问题上，而是集中精力抓城市的重建与工业的恢复工作，1953年的农业生产水平只达到1940年的104%。（罗伊·A. 麦德维杰夫1981：32，35）

赫鲁晓夫在1953年苏共中央讨论农业问题的九月全会上，所作的《关于进一步发展苏联农业的措施》的报告中，分析了当时农业中存在的种种严重问题。

他还特别分析了苏联粮食问题。大家知道，马林科夫在1952年召开的苏共十九大报告中，宣布说苏联粮食问题已彻底解决。¹⁰1954年1月22日，赫鲁晓夫在给苏共中央主席团

的信（题为《解决粮食问题的途径》）中集中反映了他的看法。信中说：“进一步研究农业和粮食收购的状况表明，我们曾经宣布粮食问题已经解决，这是不完全符合国内粮食供应的实际情况的。”“粮食生产现在还保证不了需求，满足不了国民经济全部需要，而国家的粮食储备量又不允许我们普遍进行数量充足的谷物产品、特别是优质谷物产品贸易和米粮贸易。由于粮食不宽余，我们只得限制粮食的出口量。”“许多州、边疆区和共和国的集体农庄在完成对国家的义务后剩下的粮食，不能满足集体农庄在公共经济的一切需要。留给农庄的谷物饲料尤其少，而没有谷物饲料，畜牧业就不可能急剧发展。”“1940年其收购粮食二十二亿二千五百万普特，而1953年只收购十八亿五千万普特，即减少了三亿七千五百万普特。同时，由于国民经济的普遍发展，城市人口大大增加，实际工资的提高，国内的粮食消耗量正在逐年增加，国家掌握的粮食数量同粮食需求量的增长不相适应。”¹¹1953年粮食的收购量同1948年的收购量大致相等（分别为18.42亿普特与18.50亿普特），可是消费却增加了50%以上。这样，1953年的收购量满足不了国内粮食的必需消费量。这个差额不得不动用国家粮食储备粮1.6亿普特。赫鲁晓夫对此在信中说，这是绝对不允许的。¹²由于1953年苏联粮食歉收，这就要求“农业产量需要大幅度提高，农产品的匮乏已经严重到即使农业以每年10%的速度增长，也难以解决城市的粮食供应，因为城镇人口的增长过于迅速”（罗伊·A. 麦德维杰夫1981：59）。

应该说，斯大林逝世时苏联所面临的农业问题是极其严重的，一些苏联学者甚至指出：“再有二、三年时间，就可能发生灾难性的粮食生产危机和全国性的饥荒。斯大林没有意识到这一点。在最接近他的人当中，只有一个人真正看到了这种危险，这个人就是赫鲁晓夫。”“斯大林自己对农业一窍不通，还对农民怀有一种特别的憎恶与不信任，他从来没有参观视察过任何一个集体农庄。”“其他政府官员，如日丹诺夫、马林科夫、米高扬等，比斯大林懂得更少，十月革命前，斯大林到底还在西伯利亚的一个村庄被流放了三年，而且自己种过一个小菜园。”“赫鲁晓夫出身于农民家庭，他是斯大林的政治局成员中唯一经常去农村视察的人，他常与农庄主席交谈，努力了解他们的困难。”（罗伊·A. 麦德维杰夫1981：36）

苏联农业问题发展到如此严重的地步，已不能从十月革命前的历史原因中去寻觅借口了。1955年3月18日，赫鲁晓夫在萨拉托夫市举行的东南地区各州农业工作会议的讲话中说：“沙皇俄国没有给我们留下多少东西。但是，同志们，自从苏维埃政权成立以来，已近三十八年了。时间不算短了。因此，再往尼古拉二世身上推诿，该觉得可耻了，他早已不在人世了。”¹³农业严重落后是多种原因造成的，既有斯大林经济体制模式，特别是农业制度严重弊端的因素对农业发展的制约作用；也有具体的农业政策因素对农业发展的破坏作用，而且这方面的问题甚多：如长期来片面发展重工业而忽视农业；长期实行剥夺农民的政策；违反物质利益原则，对农产品实行高征购和低价的政策；对农村的个人副业缺乏稳定的政策；等等。赫鲁晓夫执政后，在农业方面的政策，既涉及到农业制度方面的问题，也涉及到农业政策。

4.1.2 农业体制改革的主要内容

（1）以扩权为主要内容的农业计划体制改革

如果说，苏联在战后，高度集中的指令性计划体制模式与整个国民经济发展之间所存在的矛盾，从原来的潜伏状态变得表面化了，变得比过去更加突出、尖锐了，那么，这个矛盾在农业部门显得尤为复杂，对生产的阻碍作用比其他经济部也更加严重。这是因为农业生产总是与一个自然的再生产过程密切联系在一起的，它在相当程度上依赖于自然条件，因此，农业生产活动更要求因地制宜。而在斯大林时期，苏联对农业生产实行的是与工业部门相同的严格的指令性计划管理。随着上个世纪30年代集体农庄制度的建立，苏联开始向各级地方机关和集体农庄下达了扩大播种面积与农业技术改造计划。¹⁴由于国家对农业生产计划安排得死死的，这极大地束缚了农庄、农场的主动性。另外，苏联对农庄实行与国营企业一样

的高度集体的指令性计划制度，这就忽视了农庄集体经济的特点，不尊重农庄的自主权与庄员个人的利益，在处理国家与农庄和庄员的关系时，不实行等价交换与自愿原则。

为此，赫鲁晓夫在改革农业体制方面，首先改革农业计划制度。1955年的改革是最为重要的一次。这次农业计划体制改革的主要内容有：一是农业计划工作以商品产量为出发点，大大减少给农庄农场的计划指标，即只下达农产品采购量一项指标，其他生产计划均由农庄农场根据农产品采购任务与自己内部需要来确定，即有关播种面积和结构、牲畜种类与头数、作物单位面积产量与牲畜产品率，各种农艺措施等，由农业企业自行决定。但在执行农业计划新办法的相当一个时间里，苏联还规定：集体农庄全体庄员大会通过的作物播种计划和畜牧业发展计划应提交区执行委员会审核。如果集体农庄提出的计划不能保证集体农庄以相应的作物和畜产品完成义务交售额、机器拖拉机站工作的实物报酬额、预购合同和国家收购量，区执行委员会应建议集体农庄对计划必要的修改。二是对农业计划制定的程序作了改变，即由过去农庄、农场从上级机关领取任务，改为直接由农庄、农场制定计划。三是对计划计算的方法也作了改变，即把过去按种植作物的公顷与饲养牲畜头数的计算方法改为按农产品、畜产品数量进行计算。

（2）以提高物质利益为主要目的的农产品采购制度的改革

斯大林时期，苏联实行的农产品采购制度是剥夺农民的一种重要手段，也是严重影响农业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它涉及到一系列关系：如国家、农业企业与农业生产者三者利益关系，工业与农业关系，工人与农民的关系，城乡经济关系和工农联盟关系等。这些关系处理不好，不只直接影响农业的发展，还会产生严重的社会政治影响。

在农产品采购制度方面的问题已异常突出。农产品收购价过低，致使农庄交售产品所得的收入还不够补偿生产费用。许多农庄、农场出现严重亏损；同时，还使工农业产品价格剪刀差日益扩大，严重损害农庄、农场的物质利益，从而束缚了农业生产的发展。

赫鲁晓夫为了调动农庄、农场的生产积极性，贯彻物质利益原则，在农产品采购制度方面采取了一系列措施。

第一，提高农畜产品价格。从1953年到1963年，农畜产品共提价6次。1964年与1952年相比，全部农畜产品的收购价格提高了2.54倍，其中粮食提高了7.4倍，畜产品15倍，牛奶3.55倍。

第二，实行统一的国家收购制度。随着1958年改组拖拉机站，这就要求改革采购制度。1958年6月，决定取消义务交售制和机器拖拉机站实物报酬制，实行按地区分别规定的统一收购价格。这种价格比义务交售价格提高了2倍。

第三，在取消义务交售制与机器拖拉机站实物报酬制前，逐步放宽农产品义务交售的定额和最后取消义务交售制。根据苏共中央九月全会（1953年）决议，苏联降低了集体农庄和庄员个人副业向国家义务交售畜产品、马铃薯、蔬菜的定额。1954年，免除了拥有个人副业的庄员、职工、渔业和手工业劳动组合成员谷物的义务交售任务。从1958年1月1日起，完全取消了庄员、职工个人副业的义务交售。

由于采取了上述措施，特别是农产品收购价格的提高，使农庄收入大大提高。据有关材料，1952—1962年期间，在苏联全国集体农户的收入增长了2.9倍。

赫鲁晓夫执政后，还勾销了农庄在义务交售和支付机器拖拉机站实物报酬方面的积欠，勾销了各农庄和庄员在畜产品方面未完成的交售量。此外，还在所得税方面实行优惠政策，并增加了对农庄的贷款，延长了贷款期限，从1955年起利率几乎降低了1/2。从1956年起，改变了过去用于劳动日分配的大部分收入只能在经济年度年终发给农庄庄员的办法，而改为每月按庄员在公有经济中所做的全部劳动日发给预付款的办法。从1957年起，农庄开始逐步改行货币形式的报酬，到1960年，货币在苏联农庄庄员报酬中的比重已提高到62%。¹⁵

（3）个人副业管理制度的改革

苏联农村的个人副业，是在农业集体化过程中产生并得到不断发展的一种经济形式。个人副业主要是指农庄庄员、农场职工和农村其他居民耕种宅旁园地与自养牲畜、家禽等家庭副业。

长期来，个人副业在苏联农业经济中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据苏联官方公布的材料，在斯大林去世的1953年，个人副业生产的农产品占全苏总产量的比重是：肉为52%，奶为67%，蛋为85%，粮食为3%，土豆为72%，蔬菜为48%。个人副业在农庄庄员家庭收入来源中占26%。（陆南泉1981：166）

赫鲁晓夫上台初期在个人副业的管理方面，实行积极鼓励的政策。当时他主要出于以下原因：一是为了尽快缓解苏联面临食品供应方面的严重困难，特别需要采取一些措施来扶植个人副业的发展；二是赫鲁晓夫在1953年的九月中央全会报告中明确提出，农业落后的一个重要原因，“是违反了物质利益原则”，其中包括违反了农业劳动组合章程关于允许“每个集体农户都有权拥有小规模的经济作为个人财产”这个“最主要的原则”。

（4）机器拖拉机站的改组

改组机器拖拉机站解决的问题有：最为重要的，是要解决长期存在的、难以解决的“一块土地、两个主人”极不协调的农业管理制度；使得土地的主要耕作者——集体农庄与生产工具能紧密地结合在一起；从制度上促进和保证以扩权为主要目的农业计划制度改革。

（5）集体农庄劳动报酬制度的改革

苏联集体农庄在1956年之前，一直实行自1931年起的按劳动日计酬的制度。根据这一制度，农庄在年终缴纳所得税、偿还银行贷款、提取公积金和扣除其他必要的支出之后，把收入的剩余部分作为劳动报酬基金，按每个庄员的劳动日数，并根据每个劳动日的日值，以实物为主向庄员发给劳动报酬。这一报酬制度有明显的缺点：首先，庄员的按劳动日得到的报酬，一般要等到在经济年度结束时才能给予，这就是说，在一年内庄员没有任何固定收入。另外，劳动日的日值是随着年景好坏而波动的，因此，庄员也不清楚一个劳动日能拿到多少报酬，当然也更不知道经济年度结束时总共能获得多少收入。这种付酬制度，减弱了农庄庄员对劳动结果的物质兴趣，也就不会从物质利益上去关心农业的发展。其次，由于各种农活繁多，十分复杂，很难使劳动日记分标准定得合理与科学。随着农业经济的发展，生产力水平的提高，为了克服上述缺点，在总结了许多农庄已采取的更先进的付酬制度基础上，苏联于1956年决定改行按庄员在公有经济中所做的全部劳动日发给预付款制度。这一制度规定，年初以卢布对劳动日单价进行估算，然后按月预支报酬，到年终结算。预付款由货币与实物两部分组成。集体农庄要建立滚存的货币基金和粮食储备。货币预付基金的来源是25%的农产品销售收入和50%的采购预付定金。为了保证每月的预付款能兑现，苏联国家银行对货币预付基金的上述两项来源列入特别往来帐户。这笔钱只能由农庄管理委员会用来给农庄庄员发放预付款和按劳动日进行分配。

应该说，这次改革虽然有利于克服按劳动日年终支付报酬的一些缺点，并对提高农庄庄员对劳动成果的关注也起到一定的作用，但改革之后的庄员付酬制度其基础仍是劳动日，因此，并没有解决庄员的报酬所存在的不稳定和无保障的问题。

赫鲁晓夫执政后，为了摆脱国家面临的农业严重落后状况，使农业有个较快的发展，可以说，他是多方面采取了措施，即除了对农业制度的各个领域进行改革外，还在发展农业政策方面采取了一些重大措施。制定了垦荒、扩种玉米与畜产品产量赶超美国这三大政策。

4.2 1957年工业管理体制的大改组

按照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模式运行与管理经济，在工业部门表现得尤为突出。这是

因为：一是到了斯大林宣布 1936 年社会主义在苏联基本建成时，工业企业几乎都国有化了，这在客观上为国家对工业企业进行直接的行政控制创造了条件；二是在苏联工业中重工业特制是军事工业占主导地位，因此，国家必须牢牢地控制工业。消除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模式的严重弊端，不只是一要改革农业制度，而工业管理体制的改革，也是赫鲁晓夫面临的极为迫切的重大任务。

赫鲁晓夫上台后，从 1953 年起就已开始探索工业管理体制的改革，并着手解决工业管理中过分集中的弊端，扩大各加盟共和国对经济管理权力和企业权力的问题。

在扩大加盟共和国经济权限的同时，在 1957 年工业建筑业大改组之前，还就扩大企业经理权力采取了一些改革措施。

应该说，在工业部门推行的上述局部性改革，对调动各加盟共和国和地方的积极性与主动性起了一定的作用，加上农业方面采取的改革措施，有利于经济的发展。1956 年苏联工业产值比上年增长 11%，谷物总收获量增加 20%。可以说，1956 年是赫鲁晓夫十分得意的一年。同时，对他在苏共二十大上提出的主要经济任务——在历史上的短时期内在按人口平均计算的产品产量方面赶上和超过最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这一任务的实现充满信心。而要使整个国民经济，特别是工业顺利发展，赫鲁晓夫认为，一项迫切的任务是要对工业和建筑管理体制进行大改组。

在分析大改组的必要性时，还有两个因素是必须考虑的：一是从赫鲁晓夫本人工作经历来看，他长期工作在乌克兰共和国，这使他熟知斯大林时期的那套过度集中的管理体制存在的问题，特别看到了中央与共和国之间存在的矛盾及部门管理原则的严重弊端。所以，他一上台，就集中力量急于解决扩大地方管理经济权限的问题。二是当时苏联为了在极短的历史时期内，解决按人均计算的产品产量方面赶超最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美国的任务。但苏美之间的经济差距很大，在短期内解决这一任务是难以实现的。而赫鲁晓夫把达到这一目标的赌注压在工业和建筑业的大改组上。赫鲁晓夫在 1957 年 3 月 8 日的一次讲话中说：“我们一旦实现二月全会通过的决议，一旦发挥出自己的组织力量，工业就将突飞猛进，工业方面的成就不会小于我们在农业方面由于开垦荒地而取得的成就。根据二月全会的决议改组工作，将在我国工业中开拓出真正的生荒地。”后来，他在 5 月 22 日列宁格勒的一次讲话中说：“我们成功地开垦了生荒地并收到了很大的效果。然而，我们在改组工业管理方面将取得的一切，就其范围和意义来讲，会大大超过我们在生荒地的工作。工业中现有的（假如可以这样说的话）不是两个或三个生荒地，而是更多的生荒地，因为在工业中有数以百万计的人，而且都是技术最熟练的人。”¹⁶赫鲁晓夫确信：“将要进行的改组，能够为领导我国工业和建筑业创造极好的条件，能使国民经济的巨大潜力开始发挥作用。”（陆南泉 1991：273—274）

1957 年工业和建筑业管理大改组的主要内容是：根据部门管理体制存在的弊端，决定变工业和建筑业管理的部门原则为地区原则，即以“条条”部门管理改为“块块”地区管理，以便把工业和建筑业管理的重心从中央转到地方；通过大改组，要达到的目的是，在消除部门管理原则而产生的管理过分集中等问题和扩大地方管理经济权限的同时，以便能使国家的集中领导与提高地方经济机关、党的机关和工会组织的作用结合起来，使全国（联盟、加盟共和国和地方）的经济协调发展；大改组后，管理工业和建筑业的基本组织形式是以经济行政区来建立国民经济委员会。

为了实现上述改组的目标，采取的主要措施有：

第一，撤销联盟和联盟兼共和国的绝大多数部，总共撤消了 141 个部。与此同时，将有关部合并。被撤销的各部所管辖的企业和机构，以及保留的联盟工业部所管辖的一部分企业和机构（根据苏联部长会议批准的企业名单），移交给相应的国民经济委员会。

第二，在全苏建立 105 个经行政区。每个经济行政区建立一个国民经济委员会来管理工

业和建筑业。经济行政区的国民经济委员会是管理工业和建筑业的“基本环节”，¹⁷ 下面设立各种公司、托拉斯等经济联合组织，对企业实行具体领导。国民经济委员会有权解决过去由各部解决的重大经济问题。

第三，改变部的工作性质与职能。改组后保留的一些部，其主要任务是制定本部门的发展计划并保证其生产的高度技术水平，编制科研和设计工作计划并监督其执行。这些部的职能是通过各国民经济委员会来实现的，它们不再对企业进行直接管理。

第四，改组中央经济管理机构。既然国民经济委员会已成为经济管理的基本环节，已实行地区为主的管理原则，那么，必然要求改组中央经济计划管理机关。

在工业和建筑业大改组后，苏联国家计划委员会职能发生重大变化，成为全国计划和经济的科学机关。它的责任是深入地全面地研究国民经济的需要，考虑科学和技术方面的成就，并在此基础上提出关于发展国民经济各部门的建议。这些建议详细规定综合发展经济的可能性，并从全国利益出发合理利用全国资源。在新的条件下，国民经济计划将由共和国和行政区编制。苏联国家计划委员会应保证国民经济各部门的正确的合理的发展，并从这个立场出发检查各共和国和经济区的计划。还规定，国家计委不得干预经济区的行政管理。至于国家经委，在工业和建筑业改组后，它就被撤销，它的职能由苏联国家计委和共和国计委来实现。

与工业与建筑业的大改组相适应，苏联在物资技术供应体制方面也作了较大改革。主要内容是：把原来由国家计委、供委和各部管理与分配的绝大部分物资，下放给各加盟共和国国民经济委员会管理与分配。撤消了原来负责全国范围内物资技术供应的国家供委。物资分配和供应计划也交由各国民经济委员会编制，国家计委负责综合。

工业和建筑业的大改组，一个重要的意图是克服过分高度集中管理体制所产生的严重弊病，特别是解决部门本位主义和扩大地方管理经济的权限，提高其积极性与主动性等问题。从这个意义上，这次大改组的效果很快得到了体现，表现在：到 1959 年，按经济行政区成立的国民经济委员会管辖的工业占全苏工业总产值的 72%，地方管辖的工业占 22%，而中央管辖的工业急剧地下降到 6%。联盟预算与加盟共和国预算以及地方预算的关系也有了大的变化。1955 年联盟预算占全国预算支出的 73%，到 1960 年降至 41.2%。而同期，加盟共和国和地方预算分别从 12.5% 和 14.5% 提高到 39.1% 和 19.7%。（陆南泉 1988：637）

5 赫鲁晓夫时期改革的历史作用

总的来说，赫鲁晓夫时期的经济体制改革未取得成功，但它在苏联改革史上留下了不可磨灭的痕迹，仍有不少方面应加以肯定的。

5.1 给苏联社会留下深刻影响的改革起始时期

作为苏联历史上第一个改革者的赫鲁晓夫，在他对斯大林过度集中体制弊端有所认识的基础上，在批判斯大林个人崇拜开始解冻后，下决心在各个领域进行了改革，这对苏联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戈尔巴乔夫在其执政时期以及下台后，多次谈及这一历史时期改革的积极意义。¹⁸ 他在庆祝十月革命 70 周年大会上的报告中说：“在 50 年代中期，特别是在苏共二十大之后，变革之风吹到国家上空，人民振奋起来，活跃起来，变得更大胆，更有信心。批评个人崇拜及其后果，恢复社会主义法制要求党及其以尼·谢·赫鲁晓夫为首的领导拿出很大的勇气。开始摧毁以前对内对外政策中的刻板公式。开始试图摧毁 30—40 年代所确立的发号施令和官僚主义的管理方法，赋予社会主义以更大的活力，强调人道主义理想和价值观，在理论和实践中恢复列宁主义的创造精神。苏共中央九月全会（1953 年）和七月全会（1955 年）决议的核心是力求改变经济发展的先后次序，使联系与劳动成果挂钩的个人利害关系的刺激因素起作用。于是着重注意了农业的发展、住房建设、轻工业、消费领域和满足人的需要有关的一切。”他在《改革与新思维》一书中指出：“苏共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是我们历史上的一个重大里程碑。它对社会主义建设的理论和实践作出了很大贡献。会上和会后都曾作

出过大力量的尝试，想使国家走上正轨，想推动我国摆脱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在社会政治生活中所产生的各种消极因素。”（米·谢·戈尔巴乔夫 1987：47）戈尔巴乔夫在下台后发表的著作中说：“由于苏共 20 大而对‘个人迷信’进行的批判……变革开始了，整个社会气氛改变了。这是摆脱极权主义的第一步。”“赫鲁晓夫是改革的先驱者。他第一个推动了改革进程。”“赫鲁晓夫留下的主要东西就是使斯大林主义失掉了声誉……这是改革得以开始的前提和条件之一。因此，我承认，改革¹⁹是同赫鲁晓夫所做的是有一定联系的。一般说，我对他的历史作用是有较高评价的。”（米·谢·戈尔巴乔夫 2002：41，42，44）西方学者斯蒂芬·科恩在为麦德维杰夫等所写的《赫鲁晓夫的执政年代》一书所作的序中说：“赫鲁晓夫执政的年代，是苏联进行了真正的政治和社会改革的时期。尽管这些改革充满矛盾，而且毕竟是有限的，但在实际上，苏联社会生活的每一领域无不受到 1953 年至 1964 年这段时期变革的影响：大恐怖的结束，千百万监押在集中营的囚犯获释，为限制一些最恶劣官僚习气和特权所采取的措施；公众的觉悟，知识界越来越多地参与政治；一系列经济和社会福利的改革；以及导致我们今天所谈的‘缓和’的外交政策的变化；等等。这个常常被称为‘非斯大林化’的改革过程，有许多值得注意的特点，其中远不只是它的发生没有引起长时间的暴力或动乱和往往出人意料这两点。”他还批评说，西方一些研究苏联问题的学者，由于“他们被斯大林二十五年的恐怖专制主义统治及其强加给社会和官场的畏惧、尊奉、僵化的形象所束缚，也被他们自己头脑中固定不变的‘极权主义’的苏维埃模式所禁锢，感到难以想象任何重大、持久的变化。他们否认或者看不到，在赫鲁晓夫作为苏联领导人当权的整个时期内，这种变化已经发生，而且进行改革确是赫鲁晓夫的本意。”（罗伊·A. 麦德维杰夫 1981：1—2）

有关评论赫鲁晓夫的论著卷帙浩繁，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但笔者认为，不论是赞誉还是诋毁，但有一条是不能否认的：赫鲁晓夫顶住了巨大的压力，勇敢地站出来揭露斯大林，破除个人崇拜，成为苏联第一个改革者，使苏联历史上翻开了新的一页，活跃了气氛，振奋了人心，给苏联历史上留下了谁也不能抹煞的深深的印痕。美国前总统尼克松的下面一段话是有道理的。他说：“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的年代里，没有一位世界领袖人物的成败能像赫鲁晓夫的成败如此急剧地和决定性地改变历史的进程。”（尼克松 1984：230）这就是为什么笔者在论述赫鲁晓夫时期改革的意义时，首先是从他的改革对改变苏联历史进程的影响这个大视角来考察的。苏联不少学者也指出，当时赫鲁晓夫的改革，是符合社会发展已经成熟与需要的，改革对当时官僚化的苏联引起了一场“地震”，在国内和国际关系方面都产生了“良好的变化”。

5.2 推进了经济理论的发展

在斯大林时期，个人崇拜严重地束缚着人们的思想，僵化的教条主义盛行，在理论上不可能与时俱进。1956 年苏共二十大后，斯大林垄断理论局面结束了，他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与由他定稿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提出的经济理论观点，再也不是神圣不可侵犯的绝对真理了，新情况要求人们在经济理论的研究方面克服书呆子习气和教条主义。主管意识形态的苏共领导人苏斯洛夫在苏共二十大发言中也强调：“苏维埃社会的发展已经进入应当把主要的注意力集中在研究和探讨经济科学的阶段了。”“由于部分经济学家和哲学家脱离实际，书呆子习气和教条主义得到了广泛的传播。这种书呆子习气的坏毛病的实质不单纯在于染上这种毛病的人所作的引证是否恰当，而在于他们认为真理的最高标准不是实践，而是权威人士对问题的言论。他们丧失了研究具体实际情况的兴趣，他们用选择引文和巧妙地搬弄引文来代替一切。他们认为稍微违反引文就是修改原理。书呆子们的这种做法不仅没有好处，而且还有害处。”应该说，在赫鲁晓夫时期围绕经济体制改革展开的经济理论讨论十分活跃，特别在商品货币关系等主要问题上，苏联学者提出了不少新的看法。尽管经济理论的发展受历史条件的影响，且仍有很大的局限性，但毕竟是对多少年来不容有半点怀疑的斯大林经济理论是一次巨大的冲击，让人们有可能根据实际已变化了情况去探索理论和发展理

论，可称得上是苏联经济理论的一个重要发展时期。赫鲁晓夫时期展开的经济理论大讨论，它的重要意义还在于：一是为苏联以后的经济改革作了一定的舆论和理论的准备；二是赫鲁晓夫在苏联这么一个大国推行改革政策，又积极提倡改革理论的讨论，这对东欧一些国家相继在 20 世纪 60 年代中期实行经济体制改革有着十分重要的影响。

5.3 提出社会主义各国可以有不同的体制模式

随着经济体制改革与理论的发展，赫鲁晓夫提出，各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可以走不同的道路，可以有不同的体制模式。他在反对斯大林个人崇拜与开展体制改革过程中意识到，苏联长期以来把自己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及体制模式视为样板，不允许别国偏离一步，否则就动辄批判、开除，甚至加以镇压的做法，是不可取的。正当世界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同声谴责南斯拉夫背离社会主义、复辟资本主义之际，赫鲁晓夫于 1963 年 8 月赴南访问。他在访问期间公开发表演说，指出：南斯拉夫是一个“先进的”社会主义国家，在那里，不是“空谈革命”，而是“具体建设社会主义”，南斯拉夫的发展是“对总的国际革命工人运动的具体贡献”。²⁰

南斯拉夫是社会主义国家率先改革的国家，它第一个宣布摒弃斯大林模式。人们都可以看到，尽管南斯拉夫所进行的改革，虽然有不少问题，有些问题还十分严重，并且也没有形成一个成熟的体制模式，最后也没有逃脱垮台的命运，但在斯大林的寒冬时期走了自己改革之路，确实是第一枝报春花。

5.4 经济体制改革中存在的一些应予肯定的方面

在赫鲁晓夫下台时，从苏联出现的种种社会经济问题来看，他的改革的确是不成功的。苏联经济发展的“伟大十年”是在赫鲁晓夫下台前有人制造出来的一个根本不存在的神话。这些说法是符合客观情况的。但是，赫鲁晓夫在改革经济体制过程中，也确实有一些值得肯定的东西。拿农业制度改革来说，在 1958 年前的一些改革思路与政策措施，肯定的方面应该是多一些。这主要反映在：第一，赫鲁晓夫一上台，就紧紧抓住了农业的改革，这无疑是个正确而又果断的决策。这样做，使苏联躲过了很可能出现的粮食危机和全国性的饥荒。第二，通过对农业计划制度的改革来扩大农场、农庄的经营自主权，提高物质利益原则的作用和大规模垦荒等思路，是符合当时农业发展客观要求的，特别对解决苏联当时最为关心的粮食增产问题，起了积极作用。1953 年苏联粮食产量为 8250 万吨，1954 年为 8560 万吨，1955 年 10370 万吨，1956 年为 12500 万吨，²¹ 1957 年为 10260 万吨，1958 年为 13470 万吨。这期间，粮食产量除个别年份虽出现过下降的情况外，总的来说，呈现增长的趋势。也正是在这个期间，“使赫鲁晓夫赢得了农业内行的声誉”（罗伊·A. 麦德维杰夫 1981：38）。还应该说，这对赫鲁晓夫在 1957 年苏共中央六月全会上战胜马林科夫、卡冈诺维奇和莫洛托夫反对派，并一致同意他继续留任第一书记，都起了不可低估的作用。

至于经济改革的另一个重要内容即工业和建筑业的大改组问题，苏联自己的评价是，这不能算是一次改革，而“只是一次不成功的试验”。在赫鲁晓夫下台后不久，苏联《真理报》发表的社论中，批评 1957 年的大改组是“没有经过周密思考、没有仔细权衡、没有经过实际试验的改组”。²²

以上的评价，总的来说也是符合实际的。但 1957 年的大改组，它力图解决部门与地区管理之间的矛盾，虽然未取得成功，但赫鲁晓夫搞经济行政区建立国民经济委员会的办法，毕竟是一种试验，为后人提供了经验教训，如何使部门管理与地区管理有机结合，如何发挥地方的权限来提高其管理经济的主动性，与此同时中央又不失控，这对所有当今处于经济转轨国家来说，仍是一个有待解决的最为复杂的问题之一，至今都尚在寻觅解决的途径。从苏联来说，勃列日涅夫执政后，又恢复了部门管理原则，但在他执政后期，又发现部门管理原则存在一系列问题，后来又成为阻碍工业和建筑业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正是这个原因，广

大学者在勃列日涅夫执政后期对此又展开了热烈的讨论,对部门管理原则提出了尖锐的批评意见,这也证明,在工业和建筑业中改变高度集中的部门管理原则有其必要性。

6 赫鲁晓夫时期改革未取得成功的原因

导致赫鲁晓夫时期的经济改革未获得成功的原因,是多种多样的。涉及的问题很多,这可以从多方面去分析。

6.1 赫鲁晓夫反斯大林存在一定局限性

首先要从赫鲁晓夫反斯大林的局限性谈起。不认识这一点,就难以对赫鲁晓夫时期改革出现的种种问题有个深刻的理解。

现在,人们对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反斯大林已有一个共识,即“赫鲁晓夫揭露的、批判的并力图战而胜之的是斯大林,而不是斯大林主义。也许,他真诚地相信,整个问题也就是这样,只要揭露斯大林,他就解决了使社会从过去的极权主义桎梏中解放出来的全部问题”(格·阿·阿尔巴托夫 1998: 139)。赫鲁晓夫并不理解,揭露斯大林仅是走上革新社会道路的第一步,而更重要的是对斯大林模式,必须在经济、政治、社会精神生活等方面进行根本性的重大改革。“赫鲁晓夫的主要错误认识就在于此,而他至死也没有摆脱这个错误认识。总的看来,他真的相信,揭露了斯大林个人,他就完成了任务,完成了自己的使命,虽然对消除我们社会生活各个方面(经济、文化、意识形态、整个社会上层建筑)出现的深刻的变形现象没有做任何一点事情。”“我在读他的回忆录时感到震惊的是,他或者对一些明显的事情完全视而不见,或者是顽固地相信那些老的谎言,即使是他后来的经验已揭穿了这些谎言的时候仍然如此。例如在他回忆录中,他似乎一本正经地说,在挑选领导人问题上,用哪一个人取代另一个人的问题可经常提到代表大会和中央委员会去解决。没有这一点,‘我不知道党会变成什么样的党’。”(格·阿·阿尔巴托夫 1998: 139—140)

赫鲁晓夫揭露斯大林问题的局限性,还表现在对苏联历史发展过程中一些重大问题的错误认识。“赫鲁晓夫主张,绝不能为在‘公审’时被‘公开定罪’和斯大林的激烈反对者,如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季可夫和布哈林等人平反,就像不能让人不得安宁的魔鬼列夫·托洛茨基恢复名誉一样。他认为,斯大林在这些案子中消除了对尚处于在幼年时期的共产党国家进行破坏的‘极左’和‘极右’分子是正确的。而且在他看来,对农民残酷地搞集体化,以及二十年代末、三十年代初对一部分知识分子的镇压,也都是必要和正当的。”(罗伊·A. 麦德维杰夫 1981: 22—23)

西方学者认为,赫鲁晓夫对斯大林的指控在三个重大方面有明确的局限性。“首先,这种指控集中在斯大林‘对党的干部’以及其他政界精英‘实行大恐怖’问题上。它反映了赫鲁晓夫在50年代作为恢复活力的共产党领袖执政以及他的改革主张的局限性;它只字不提斯大林统治下无辜屈死的数百万老百姓。其次,赫鲁晓夫把斯大林的罪恶暴行说成是从1934年开始的,这等于为斯大林于1929—1933年间推行的、给农民带来极大痛苦的集体化运动辩护,把它说成是令人钦佩的必要措施;同时,这也等于宣布不准讨论关于1929年以前党内反对派对斯大林主义的选择这一禁令继续生效。最后,赫鲁晓夫把滥用权力说成仅仅是斯大林以及‘一小撮’帮凶(这些帮凶已被揭露并受到惩办)的罪过,从而回避了广泛追究刑事责任并给予惩罚的问题。他硬说(至少是公开表示过),幸存下来的政治局委员都是无罪的。”(斯蒂芬·F. 科恩 1987: 116)

上述的局限性,决定了赫鲁晓夫不能从斯大林体制模式的根本性弊端这个角度去思考问题和进行改革。

赫鲁晓夫对斯大林问题认识之所以存严重的局限性,这与赫鲁晓夫是斯大林时代的产儿,是斯大林体制形成与发展时期产儿有关。正如阿尔巴托夫说的,赫鲁晓夫的“主要问题

在于他本人就是那个时代的产物，斯大林主义的产物”。因此，要靠他来“清除斯大林主义遗产方面做更多的事，他多半是根本做不到的。”这样，“在政治上他变成了‘在原地跑步’”。（格·阿·阿尔巴托夫 1998：141）对此，麦德维杰夫分析说：“赫鲁晓夫同时又是斯大林的门生，是斯大林时代的一个产物，那个时代训练了他在政治上的灵巧熟练，也为他留下一部具有残酷无情、审慎从事以及那种可以置某些明显真理不顾之机敏颖悟的遗产。”（罗·亚·麦德维杰夫 1988：4）因此，就产生了赫鲁晓夫这位“非同寻常的、带有悲剧性的双重意识的矛盾人物。他在苏共二十大所作的关于揭露斯大林镇压的报告，这是在政治上走出的出色的一步，它在很多方面决定了斯大林去世后的过渡时期事态发展方向。他想要同斯大林主义分手，但不是同这种制度分手。他虽同这种制度的创造者决裂，可是他崇拜由这位创始者所创造的世界。这种矛盾无法解决，但他不懂得这个道理”（亚·尼·雅科夫列夫 1999：202—203）。赫鲁晓夫“给了社会一点儿自由，后来他自己拧紧了龙头”。正如他在自己的回忆录中说的：“苏联领导决定开始解冻时期，并自觉地走去的时候，大家，也包括我在内，同时对解冻感到担心：‘会不会因解冻而出现冲向我们的洪水，这就将很难处理。’”“在赫鲁晓夫的活动中有许多与他的生活道路的特点（从政治意识形态上说他是斯大林派的活动家，在他的良心中也有斯大林制度的罪恶的阴影）以及他的个性相联系的矛盾。他往往是进一步，退两步。这儿碰碰，那儿撞撞。”（米·谢·戈尔巴乔夫 2002：43—44）这些都说明，赫鲁晓夫执政期间，在体制改革和重大国内外政策方面出现的摇摆、前后不一贯、不彻底性和动摇性的原因，不能归结为纯属他个人的弱点（如虚荣心）和实用主义（争权）。

6.2 改革没有离开斯大林体制模式的大框架

与上述因素相联系，赫鲁晓夫时期的改革，从来没有离开斯大林体制模式的大框架。

赫鲁晓夫在改革过程中，往往是一只脚向民主迈进，另一只脚却陷入了教条主义和主观主义的泥潭。（尤·阿克秀金 1990：3）

由于赫鲁晓夫个人的经历，他在反斯大林过程中，也能感悟到战后新时代将会到来，但他又无力自觉地把握住战后时代转换的重要契机，深刻地转变斯大林留下的不能再继续推进社会经济进步的体制。很明显，他只能是个过渡性人物，而不是能担当推进苏联社会大步前进、改变旧体制的代表新生力量的人物。

从经济理论上讲，为了进行改革，虽然取得了一定进展，但赫鲁晓夫时期并没有摆脱斯大林“左”的教条主义。拿讨论得最多的商品货币理论来说，到 1961 年通过的《苏共纲领》，也只是说它具有新内容和加以充分利用而已，根本没有人提出经济体制改革要以市场经济为方向，强调的还是指令性计划。在所有制问题上，赫鲁晓夫同样是片面追求“一大二公三纯”。在他执政时期，急于消灭手工业合作社，向单一的全民所有制过渡；在赫鲁晓夫的倡导下，人们搞起扩大集体农庄规模的事来，有的地方甚至把 30 来个、甚至更多的农村合并成一个大集体，也就是说，成立了根本无法管理的集体农庄。“合并集体农庄，而且常常是胡来的令人不快的合并，这也是集体化的继续，确切地说是集体化的大功告成。”1958 年砍掉农村个人副业，认为它影响了公有农业经济发展。这种错误思想，“是赫鲁晓夫对农民，也是对全体人民犯下了滔天大罪”。（亚·尼·雅科夫列夫 1999：16）在“左”的思想支配下，赫鲁晓夫超越社会发展阶段，急于向共产主义过渡……

政治体制改革的局限性，也使得赫鲁晓夫经济体制改革难以从传统体制中解脱出来。应该说，赫鲁晓夫在揭露斯大林问题过程中，力图推进苏联政治民主化进程，他针对斯大林政治体制存在的弊端，提出了反对个人集权、加强党的集体领导、加强法制、反对个人专横行为、反对干部终身制和提出实行干部任期制等。这些改革措施在赫鲁晓夫执政的头几年（1958 年前）取得了一定进展，但到执政后期，有的改革措施并没有贯彻到底，有的被赫鲁晓夫自己破坏。譬如，他自己搞集权乃至个人迷信；又如，他通过干部制度的改革，并没有建立起一套民主、科学的选拔干部制度，“他挑选干部越来越不按德才兼备的原则，而按忠实于人，

叫干啥就干啥的原则”。²³ 他反对党政合一，后来又实行党政合一，赫鲁晓夫作为党的第一书记又兼任部长会议主席；对外同样搞霸权主义；等等。

产生这种情况虽有多种原因，但主要的是赫鲁晓夫时期的政治体制改革没有从根本上触动其要害即权力过度集中。按照熟知苏联内情的阿尔巴托夫说法，“赫鲁晓夫完全是有意地不想放弃从斯大林时期继承下来的政治制度的，因为他作为党的头头知道这样做会直接威胁到他自己的利益，因为他想像不出用以取代这种制度的其他方法。如果你不想在政治和经济体制中实现深刻的变革(而赫鲁晓夫是不想的)，掌握权力就会越来越变成目的本身。他不想放弃过去的政治制度。如果将从斯大林那里继承下来后，当年斯大林建立它们正是为了确保‘个人专政’(尼基塔·谢尔盖耶维奇在回忆录里用了库西宁的这个概念，看来，这个概念深深地印在他心上——显然他不了解这个概念的全部涵意)的许多机制原封不动的保留下来，那么领导党和国家就可能简单得多和方便得多了。他还欣赏对他本人的颂扬，当然不是斯大林时期的那种凶险的血腥的个人迷信，但毕竟是十分有害的”(格·阿·阿尔巴托夫 1998: 140)。著名苏联历史学家麦德维杰夫与阿尔巴托夫在这个问题上有共同的认识。他说，赫鲁晓夫“本人肯定没把扫除他前任所建立的那种政治体制当成自己的任务，相反，为了巩固他自己的权力以及实施某些政治和经济上的改革，他还充分利用了这种体制的独裁主义结构”(罗·亚·麦德维杰夫 1988: 2)。

以上分析说明，赫鲁晓夫执政时期，不论是经济体制改革还是政治体制改革，都没有改变斯大林模式的大框架，高度集中的指令性计划经济与高度集权的政治体制交织在一起，互为需要，从而成为阻碍体制改革的一个重要因素。

6.3 经济体制改革本身存在一系列问题

首先，从改革思路来讲，为了克服传统体制的弊病，在改革开始阶段，首先应把中心放在改革经济机制和调整经济关系上，即要调整好国家与企业的关系，扩权让利，重视商品货币关系与经济杠杆的作用。而 1957 年的工业和建筑业大改组把中心放在调整经济管理组织形式上，只是把经济管理的重心由中央转到地方，管理机构从条条搬到块块，即只是在条条与块块、中央与地方的关系方面兜圈子。由于上述原因，大改组的结果是，只是从一种行政手段转为另一种行政手段，即从中央的行政指令方法转向地方的行政指令方法。另外，由于改组的核心是取消部门管理原则，因此花大力气分析了部门管理存在的种种问题，但并没有注意部门管理的客观合理的内核，并努力在改组中解决地区管理与部门管理如何合理地结合的问题。

其次，从改革的步骤来看，1957 年大改组确实是未经充分准备，仓促上阵，事先也未经过试验。正如一些苏联学者指出的：“这样全面的工业改革，不言而喻是一项十分复杂的工作，应该经过几个州若干年试点后，再在全国范围内推广。报刊上对改革计划的种种分析，不能代替实际的尝试。”(罗伊·A. 麦德维杰夫 1981: 103) 改组的结果使企业下放过了头，权力分散过了头，例如，大改组后，使中央管辖的工业产值在全苏工业产值中的比重大大下降，从而削弱了国家对国民经济必要的集中统一领导和计划管理，致使地区的“分散主义”和“本位主义”泛滥。“差不多在每个管理局中都有分散力量的情况。”²⁴ 赫鲁晓夫在打破原来的部门管理体制的同时，并没有建立起一套新的管理体制。

最后，从改革方法来看，赫鲁晓夫往往凭个人的主观愿望，依靠行政命令强制推行改革，特别是到后期，随着赫鲁晓夫领导地位的确定，他的头脑日益膨胀起来，个人专断，唯意志论日益增长。苏联学者布拉尔茨基发表的文章中分析说，赫鲁晓夫的改革是不彻底的和低效益的。其原因是由于他用传统的行政方法、官僚主义方法搞改革，不重视人民群众的作用，没有发动劳动人民为改革而斗争。²⁵ 这个说法是有道理的。这里特别要指出的是，赫鲁晓夫对农业心血来潮的改革和对农业发展政策的瞎指挥尤为突出，他不顾条件的扩种玉米，取消

农民的个人副业，停止采用草田轮作制，通过政治压力在短期内改组了机器拖拉机站……这些都对农业的发展带来了极其不利的影响。

6.4 改革涉及大量人事变动

从政治角度来看，由于赫鲁晓夫的改革，涉及到大量的人事变动，侵犯了很多人的利益，对此事先又没有充分考虑，也未作出应有的安排。

在这方面赫鲁晓夫面临的挑战是十分严峻的，例如，他要取消领导干部终身制，对于党的选举产生的各级领导机关（从地方到中央委员会成员），采取按一定比例经常更换的制度。每次选举时，苏共中央委员会及其主席团成员至少更换 1/4，1962 年苏联最高苏维埃的代表在选举中更换了近 70%；²⁶他还取消了高级干部（如州委书记、中央委员、报纸主编等）的相当可观的月薪“津贴”，对局级干部不再配备司机，不再提供可以随意到任何地方去的专车；在工业和建筑业大改组时，引起大量领导干部的调动；在农业改革过程中，由于赫鲁晓夫的鲁莽和急躁，改组了从农业部、大中农业机构、农学院到试验站的整套政府结构。让农业部离开莫斯科，迁到农村，农业部工作人员失去了在莫斯科舒适的办公室，与此同时，各加盟共和国也采取了类似的做法。并且，从苏联农业部长到各加盟共和国农业部长，都由一个国营农场的场长来担任。一年之内，2200 名工作人员中有 1700 名接到了调离的通知，其中大部分是职务较高的领导人。农业院校也迁到了农村。不论是农业部还是农业院校的工作人员，由于农村条件差，造成了大量农业工作人员包括农业专家的流失……赫鲁晓夫上述种种做法中，有关反特权的措施有其积极意义，但必然引起原来受益者反对。至于在农业改革中的一些做法，既导致了农业灾难，又引起了农业部门干部的反。

以上情况说明，赫鲁晓夫在改革过程中，触犯了很多，在客观上树立了一批“政敌”或“反对派”。在这种情况下，即使是正确的改革方案，也难以贯彻和取得成功。

6.5 赫鲁晓夫个人的性格因素

赫鲁晓夫个人的性格，尽管对改革的失败不起主要作用，但也是不可忽视的因素。

苏联著名政治家布尔拉茨基写道：“赫鲁晓夫不仅是环境的牺牲者，而且也是其性格的牺牲者。急性子、过于匆忙、容易激动，这是他无法克服的缺点。”他还引证 1956 年赫鲁晓夫和布尔加宁访问英国期间，在苏联大使馆举行招待会上，邱吉尔对赫鲁晓夫说的话：“赫鲁晓夫先生，您在着手大规模改革，这当然好！我只是想劝您不要操之过急。靠跳跃两步跨越鸿沟是相当难的，还可能会坠入沟中。”“我（布尔拉茨基——笔者）冒昧地试着以个人名义补充一句：当你没有看清，准备跳到那个岸上时，是不能跨越鸿沟的。”（尤里·阿法纳西耶夫 1989：606）

6.6 不可忽视的国际压力

赫鲁晓夫要推进体制改革，阻力不只来自国内保守势力和传统的意识形态，而且还有来自国际的压力。1956 年苏共二十大揭开斯大林盖子后，西方国家利用斯大林问题大肆攻击社会主义制度，在资本主义国家的共产党陷入了严重困境；而在东欧一些原社会主义国家出现了混乱，发生了波兰和匈牙利事件；中苏两党因在斯大林问题上产生不同看法和加上其他因素，导致历时十年之久的有关建设社会主义道路和国际共运的意识形态的大论战。这种压力，使赫鲁晓夫反斯大林个人迷信和改革时而出现动摇。阿尔巴托夫谈到这一问题指出：“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困难使得赫鲁晓夫转而放慢而不是加速去克服斯大林主义，放慢而不是加速去进行改革，首先是实行国家政治生活的民主化。”“在赫鲁晓夫和当时的整个领导对东欧一些国家，尤其是匈牙利和波兰政治危机作出的反应中，这一点表现得更为明显。”而中国因素对赫鲁晓夫在这一转变中，也起了不小的作用。中国先后发表一论、再论《无产阶级专政历史经验》两篇文章和“九评”，在当时形势复杂和思想混乱的条件下，“中国的宣传就不难于在一些问题上把我们吓住，迫使我们处于守势，促使我们采取前后不一贯的、或者完全错误的立场”。（格·阿·阿尔巴托夫 1998：66，133）

这里顺便就关中苏大论战问题说几句。1989年5月邓小平在会见戈尔巴乔夫时说：“经过二十多年的实践，回过头来看，双方都讲了许多空话。”“多年来，存在一个对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的理解问题。”“马克思去世以后一百多年，究竟发生了什么变化，在变化的条件下，如何认识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没有搞清楚。”²⁷从邓小平的谈话中可以看出，中苏大论战脱离了已经变化的历史实际，论战双方尽管都以“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自居，而实际上并没有弄懂什么是马克思主义，什么是社会主义。大论战是一场“空对空”、“左对左”的论战，后来发展到中国“极左”。从总体来说，赫鲁晓夫不是右，而是“左”，这样就形成了中国的“极左”对赫鲁晓夫的“左”。后来，又给赫鲁晓夫扣上了修正主义帽子。邓小平曾对法共领导人马歇说：“我们的错误不是个别的错误，我们的错误在于以我们的标准去评判别人的实践和是非，违反唯物辩证法。”这样的背景下，对赫鲁晓夫进行浅层次的、不触及斯大林模式要害的改革横加批判，“九评”连赫鲁晓夫在改革经济体制过程中提出物质刺激、利润原则、改变官僚主义的农业计划制度等，都说成是在苏联复辟资本主义，是修正主义。大论战，无疑对苏联当时正在进行的经济改革会产生影响。对中国的影响是，强化了斯大林模式，理论上更加教条化。更为不幸的是，大论战和农村开展社教运动实际上为文化大革命做了理论、舆论和政治准备，把中国最后带入文化大革命的十年浩劫，全国上下到处抓大大小小的“赫鲁晓夫”。

这里顺便谈谈赫鲁晓夫下台的原因。现在大家都知道，赫鲁晓夫下台并不是中国“九评”批倒的。赫鲁晓夫下台后，我们发表了《赫鲁晓夫是怎样下台的？》一文，文章的立论没有哪个是站得住的。1964年11月9日，周恩来和苏共新领导会谈时，苏共中央主席团委员米高扬说：过去苏共是集体领导的，在同中共中央分歧问题上，苏共中央内部甚至在细节上也是没有分歧的。后来，周恩来询问赫鲁晓夫下台政治原因，苏共新领导没有立即答复，只是到了第三次，即最后一次会谈时，苏共新领导用了20分钟时间泛泛答复周恩来说：苏共二十次代表大会、第二十一次代表大会和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通过的路线和苏共纲领是正确的，不可动摇的。赫鲁晓夫主要是在国内工作的某些方面，以及在工作作风和领导方法方面犯了一些错误。（王泰平1998：259—260）这说明，苏共方面认为，赫鲁晓夫在中苏关系方面并没有错，当然，大论战也不是影响赫鲁晓夫领导地位的原因。

赫鲁晓夫下台的真正原因，苏斯洛夫在1964年召开的苏共中央十月全会上所作的主题报告中作了说明。他列举了赫鲁晓夫一系列的严重错误。但在苏共中央全会召开前，苏共中央主席团曾委托主席团委员波利扬斯基起草苏共中央主席团向苏共中央全会的报告。之所以没有采用波利扬斯基起草的报告而最后采用苏斯洛夫的报告，其主要原因有：一是波利扬斯基起草的报告虽较全面、深刻和尖锐，但有些错误的责任很难说完全由赫鲁晓夫一人承担，中央主席团其他成员也难脱干系，出于策略考虑，未加采用。而苏斯洛夫的报告方案较温和、只是概括地、粗略地列了赫鲁晓夫的主要错误。二是苏斯洛夫的报告方案回避了对外政策方面，特别是在同与各国共产党关系方面的错误。而波利扬斯基起草的报告，涉及到对外（包括对各国共产党国家）的关系，并还在总体上肯定苏共反华政策的前提下，也承认对华政策中的某些错误。两份报告虽有差别，但基本内容的观点是一致的。并且，这两份报告的一开头，都强调苏共二十大的各项决议和党的纲领所确定的路线是正确的。赫鲁晓夫下台的主要是因苏联国内问题。

从经济角度看，由于改革未取得成功，使得经济状况呈现恶化的趋势并出了混乱的局面。一些国民经济综合指标下降。根据苏联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提供的材料，社会总产值从1956年到1963年8年间，增长速度降低了一半。农业状况也十分糟糕。

从政治体制角度看，赫鲁晓夫所犯的严重错误是背离列宁主义集体领导原则，把无限的权力集中在自己手里，但又不善于、不正确地运用这权力。这样就造成以下的状况：对带有根本性的重大的内外政策问题，中央集体无法进行自由的、切实的讨论。赫鲁晓夫公然无视

党与政府领导集体的意见，不再考虑其他领导人的主张，不把任何人放在眼里，力图建立他的个人专政；赫鲁晓夫自以为绝对正确，骄傲自满，毫无根据地企图充当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伟大理论与实践家；他把一切成就不是归功于党，而是全部为功于他个人；他到执政后期，尽量摆脱苏共中央及其主席团的监督；在工作中，不尊重别人，只要别人谈谈自己的看法，立即就被打断，经常怒气冲冲的吼叫，极端粗暴，为所欲为，任性，心胸狭窄和热衷于发号施令；赫鲁晓夫的个人迷信虽未最后形成，正处形成过程中，处于复发阶段；……一句话，在苏共中央“形成了一种令人不能容忍的局面，使得中央主席团不能正常地进行工作”。²⁸正是在这种情况下，苏共中央主席团不得不下决心让赫鲁晓夫离开领导岗位。

写到这里不仅要问，赫鲁晓夫上台后就花很大精力花在反对斯大林个人迷信、揭露其独裁政治产生的严重弊端问题上，后来，他为什么在不少方面又走斯大林的老路呢？斯大林的一些不良品质又在赫鲁晓夫身上得到反映呢？在波利扬斯基起草的报告中，对此作了一些分析。事情的发生亦是有个过程的。斯大林去世后，苏共“一面揭露对斯大林的个人迷信，一面遵循列宁的警告，并没有立即委托给赫鲁晓夫同志无限的权力。初期他仅仅领导苏共中央，担任苏共第一书记。在这一时期，尽管他犯过一些错误和失误，总的说来还是相当谨慎地使用权力，尊重领导人集体的意见。因此，当1957年推举部长会议主席人选时，党中央委员会提名赫鲁晓夫，认为他在这方面也会正确地使用权力。他当时的行为没有引起人们的担心。此外，当时允许这种权力集中还出于一些国内和国外形势的考虑。”“我们党及其中央委员会，在推举赫鲁晓夫同志担任苏共中央第一书记和苏联部长会议主席之后（在1958年3月27日召开的最高苏维会议上，苏联为了加强党对军事部门的一元化领导，成立了最高国防委员会，赫鲁晓夫任主席。从此，赫鲁晓夫成了像斯大林一样的人物，把党政军大权都集中到自己手里。这样，赫鲁晓夫登上了权力的顶峰。——笔者注），不断地对他表示关注，使他能够出色地履行这些崇高的职责，少犯错误，少出差错，使他的威望不断提高和巩固。的确，由于苏共中央委员会和全党的努力，为他树立了不小的威望。”“应当承认，赫鲁晓夫同志在初期似乎还能理解这些事实真相，对自己的威信所以不断提高似乎还有自知之明”。“大概正因为如此，我们的警惕在某种程度上放松了。”“当时的形势也助长了这个问题的发展。我指的是派别活动分子——对斯大林个人迷信的拥护者向党发动进攻的那个时期。当然，他们也向赫鲁晓夫同志发动了进攻。我们在反击的过程中，按照斗争的逻辑，不得不说许多赞扬赫鲁晓夫的话，而且那时又不能批评他。看来，他由此得出关于他本人的、完全不正确的结论。”这里可以看到，在高度集权的政治体制没有触动、在党内没有民主、对最高领导缺乏监督机制的条件下，起初沿着正确路线前进的赫鲁晓夫，之所以会背离这条路线，“这首先是权力过分集中在一个人手中的结果”。“权力集中在一个手中，势必潜伏着产生严重危险的可能性。”

7 结束语

历史事实告诉我们，搞个人崇拜、大权集中在一个人手里，又缺乏有效的监督机制，这是发生重大错误甚至是灾难无法纠正的危险开端。我们应该永远记住这个历史教训。个人崇拜既然是高度集权体制的产物，因此，必须从体制上去解决。亚·尼·雅科夫列夫对此说道：“人是脆弱的：绝对的权力使人绝对腐败。”（亚·尼·雅科夫列夫 1999：18）说得多有哲理啊！

附注

1 从斯大林1953年3月5日去世到同年9月7日赫鲁晓夫任苏共中央第一书记前这段时间中，马林科夫主持苏共中央主席团工作。

2 《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论战》，北京：人民出版社，1965年版，第519—520页。

- 3 张岱云等译：《赫鲁晓夫回忆录》，北京：东方出版社，1988年版，第504页。
- 4 《铁托在普拉的演说及有关评论》，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66年版，第78页。
- 5 《邓小平文选》第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33页。
- 6 《陶里亚蒂言论》，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66年版，第90页。
- 7 《关于波兰局势》，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57年版，第23页。
- 8 [苏联]《真理报》，1955年6月2日。
- 9 参见《苏联共产党和苏联政府经济问题决议汇编》第四卷，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149—150页。
- 10 马林科夫在苏共十九大是这样讲的：“今年（1952年），谷物的总收获量达80亿普特，而最主要粮食作物——小麦的总收获量比1940年增加了48%。以前认为最尖锐、最严重的问题——谷物问题——就这样顺利地解决了，彻底而无可改变的解决了。”
- 11 《赫鲁晓夫言论》第三集，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65年版，第3页。
- 12 参见《赫鲁晓夫言论》第三集，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65年版，第3—4页。
- 13 《赫鲁晓夫言论》第四集，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65年版，第112—113页。
- 14 有关内容可见本书第二章第三节有关部分的论述。
- 15 参见苏联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编、盛曾安等译：《苏联社会主义经济史》第六卷，北京：东方出版社，1986年版，第527页。
- 16 《赫鲁晓夫言论》第六集，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65年版，第63，347页。
- 17 参见《赫鲁晓夫言论》第六集，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65年版，第116—117页。
- 18 戈尔巴乔夫和苏联大多数官方人士、学者以及西方学者一样，对赫鲁晓夫时期的改革既有积极的评价，也提出了尖锐的批评性看法。在本章下一节分析赫鲁晓夫时期改革不成功原因时，我们将会引用戈尔巴乔夫等人的一些分析。
- 19 系指戈尔巴乔夫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自己推行的改革。——笔者
- 20 参见赫鲁晓夫1963年3月30日在南斯拉夫维堡涅市群众大会上的讲话。
- 21 这是1956年以前苏联历史上最高产量，而在12500万吨粮食产量中一半以上产自新的开垦区。苏联学者指出：“若不是多亏新开垦的处女地获得丰收，苏联在1956年几乎肯定要发生饥荒”（见[苏联]罗伊A. 麦德维杰夫等著、邹子婴等译：《赫鲁晓夫的执政年代》，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63页）。
- 22 [苏联]《真理报》，1964年11月8日。
- 23 引自解密档案材料，俄联邦总统档案全层3号全宗，67号目录，223号案卷。
- 24 [苏联]《消息报》，1963年11月3日。
- 25 参见[苏联]《文学报》，1988年2月24日。
- 26 [苏联]《真理报》，1962年4月25日。
- 27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91页。
- 28 引自俄罗斯联邦总统档案馆3号全宗，67号目录，223号案卷。

参考文献

- [1][俄罗斯]格阿阿尔巴托夫著. 徐葵等译. 苏联政治内幕：知情者的见证[M]. 北京：新华出版社，1998.
- [2]汉斯·莫德罗. 我眼中的改革[M]. 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2.
- [3]李慎明主编. 居安思危——苏共亡党二十年的思考[M]. 北京：社科文献出版社，2011.
- [4]陆南泉. 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在农村私人经济政策[A]. 苏联经济研究会编. 苏联经济体制问题[C]. 北京：时事出版社，1981.
- [5]陆南泉主编. 苏联经济简明教程[M]. 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1.
- [6]陆南泉等编. 苏联国民经济发展七十年[M]. 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1988.

- [7] [苏联] 罗亚 麦德维杰夫等著. 肖庆平等译. 赫鲁晓夫传[M]. 北京: 中国文联出版公司, 1988.
- [8] [苏联] 罗伊 A. 麦德维杰夫等著. 邹子婴等译. 赫鲁晓夫的执政年代[M]. 长春: 吉林人民出版社, 1981.
- [9] [苏联] 米谢 戈尔巴乔夫著. 苏群译. 改革与新思维[M]. 北京: 新华出版社, 1987.
- [10] [俄罗斯] 米谢 戈尔巴乔夫著. 徐葵等译. 对过去和未来的思考[M]. 北京: 新华出版社, 2002.
- [11] [美国] 尼克松著. 刘湖译. 领袖们[M]. 北京: 知识出版社, 1984.
- [12] [美国] 斯蒂芬 F. 科恩著. 陈玮译. 苏联经验重探[M]. 北京: 东方出版社, 1987.
- [13] 王泰平主编. 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第二卷) [M]. 北京: 世界知识出版社, 1998.
- [14] 邢广程. 苏联高层决策 70 年(第三分册)[M]. 北京: 世界知识出版社, 1998.
- [15] [俄罗斯] 亚尼 雅科夫列夫著. 徐葵等译. 一杯苦酒——俄罗斯的布尔什维主义和改革运动[M]. 北京: 新华出版社, 1999.
- [16] [苏联] 尤里 阿法纳西耶夫编. 王复士等译. 别无选择[M]. 沈阳: 辽宁大学出版社, 1984.
- [17] [苏联] 尤 阿克秀金编. 李树柏等译. 赫鲁晓夫——同时代人的回忆[M]. 北京: 东方出版社, 1990.

Re-comment on Khrushche's reformation after 60 Years

Lu Nan-quan

(Center for Russian Language, Literature and Culture Studies of Heilongjiang University, Harbin 150080)

Abstract: After sixty years, it is still no comprehensive appraisal of Khrushchev and the historical effect of his ruling period. This paper takes the historical facts as evidences, reflects some questions about Khrushchev's ruling period, tries to analyze Khrushchev and the important historical problem in his ruling period comprehensively and objectively.

Keywords: Khrushchev; reformation; reflection

作者简介: 陆南泉, 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 黑龙江大学俄罗斯语言文学与文化研究中心兼职研究员。

收稿日期: 2016-03-10

[责任编辑: 惠秀梅]